

黄帝祭祀的文化意蕴

何源

(西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黄帝祭祀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历千年而不衰,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礼仪活动,其文化意蕴显而易见:从血缘角度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诸族对血缘始祖的祭祀;从文化角度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诸族对人文初祖的祭祀;从祭祀性质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儿女对血缘始祖与人文初祖祭祀的统一。

关键词:黄帝祭祀;祖先祭祀;人文初祖;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3-0014-06

黄帝祭祀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它肇始于黄帝逝世之时,经过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一直延续至今。作为一项重大的礼仪活动,每个时代的黄帝祭祀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不同时代各自的时代特征。

一、当今黄帝祭祀是血缘角度的祖先祭祀

史前和三代是将黄帝作为祖先祭祀的。封建社会的黄帝祭祀中,黄帝仍然具有祖先的身份,但往往兼具神格,或者突出其作为“古代帝王”的身份。今人对于黄帝为“古代帝王”的观念有不同于古人的解释。当今的黄帝祭祀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福惠八方的史前人物,作为德业辉煌的文明开创者,黄帝祭祀的祭祖性质更加彰显。

从血缘的角度出发,通常称黄帝为“华夏始祖”。华夏族形成的基础是以黄帝为中心的早期族系联盟。黄帝首先被本部族子孙视为血缘始祖,随着黄帝部族繁衍生息,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了黄帝族的血统。黄帝的名号“轩辕”实即“玄鼋”,亦即“天

鼋”,本是一种龟蛇类的水族动物,它成为黄帝族的图腾,反映着该部族对这种水族动物的崇拜。通过对“天鼋”铜器群的研究,学者发现众多天鼋部族从史前到商周一直存在^[14]。研究者还通过对与黄帝族相对应的庙底沟类型考古文化的观察分析,指出陕西、山西、河南的众多庙底沟类型氏族部落已经联结为一个具有相同文化、习俗、信仰的整体,并以此为前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族类。黄帝族的兴旺发达还使黄帝的血脉延伸到其他的部族,最早受到影响的就是炎帝族。炎黄原本是远缘亲属部落,同发源于西北黄土高原地区,东迁途中又如影随形。炎黄两族有时亲密相处,有时互相争斗,但是无论相亲还是相争,结果都是促进了两族相互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随着黄帝族在“炎黄”联盟中取得主导地位,黄帝渐享独尊,“黄”的色彩日益凸显,有的炎帝族苗裔也自认为黄帝所出。例如屈原在《离骚》中交代身世时肯定地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①。“帝高阳之苗裔”也就是黄帝之苗裔。事实

① 《史记·楚世家》。

上,楚人为祝融之后,而祝融为炎帝之后,《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此外,楚人半姓,《说文》“半”字于羊部,释其意为“羊鸣”,又以“羌”为“羊种”,而姜羌一也;楚国二十多位国王名字前都冠有“熊”字,暗示了楚族曾以熊为图腾,而熊为姜羌图腾——从中可见楚人为炎帝族苗裔的关系——是楚属炎帝系统的有力证据^[4]。楚人既属炎帝系统,为什么又自称黄帝苗裔?究其原因,这种说法应该源于沉淀在楚人内心深处的关于族系融合的记忆。这些记忆还见于屈原的其它作品。如《天问》中的“焉有虬龙,负熊以游”,就反映了长期在楚国流传的一个炎黄两族融合后关系亲密的故事^[1]。

炎黄联盟建立后,大规模的族系融合仍在继续,东夷集团成为华夏族形成的要素。涿鹿之战后,黄帝成为中原炎黄集团与东方九黎部族的共主,更大范围的部落联盟就此产生,华夏文化共同体也开始形成。体质人类学家发现,公元前5 000~公元前4 000年之间,生活在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居民可能与传说中的炎黄部落联盟有关,而“黄河下游今山东、苏北一带大汶口文化居民比仰韶文化居民一般在颅高和面高上更高一些,面宽更宽,鼻形稍窄,身高可能稍高,并有颅枕部变形,人工拔牙和口颊含球的特殊风俗,他们大概和传说中的东夷集团有关”^[5]。进入公元前3 000年以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逐渐被龙山文化所取代。作为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居民,“和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各组人骨之间,在体质上显然存在更为密切的关系”^[6]。鉴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居民的形态特征“呈现出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两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接近关系”,研究者指出:“这种现象很可能是由于黄河中下游两个部族集团成员相融合而引起体质上的变化。”^[7]这些研究成果说明两大集团之间除了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之外,血缘也在交流,血脉日渐相连。正是在这种文化与血缘双重融合的基础之上,华夏族最终形成。既然已经水乳交融、你我难分,那么在华夏族这个有机整体内,以黄帝为血缘先祖观念的产生,就不仅是合乎情理,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进一步考察,后代的各民族中,不仅华夏族与黄帝族有血缘关系,许多少数民族也可能与黄帝

族有血缘关系,黄帝对这些少数民族也具有血缘先祖的身份,这一点可以从先秦的华夷交融来说明。《尚书·武成》载:“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孔安国注曰:“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成公七年》载:“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杨伯峻注曰:“中国,当时华夏各国之总称。”可知“华夏”指中原地区的文明发达的大国,可与早期的“中国”同义。与之对举的“四海”与“四夷”,前者是指偏远的周边地区,后者则指周边地区的居民。四夷分为南蛮、东夷、西戎、北狄,分别指周边不同方位的居民。由于种种原因,上古各族经常迁徙。中原各族迁往周边地区和周边各地区各族迁到中原地区,在史前和三代都有可考的历史事实。炎黄部族从西北黄土高原向东迁徙进入中原是史前各族迁徙的显例。夏商之际夏人从中原外迁和原为东夷的商人入主中原,又是三代各族迁徙的突出事件。因此对于华夏族而言,蛮夷戎狄并非都是“非我族类”。诸戎是“四岳之裔胄”^①,而四岳为姜姓。楚王熊渠、熊通虽宣称:“我,蛮夷也”^②,其为炎帝族系也于史有证。此外,典籍中还有“杞,夏余也,而即东夷”^③、“禹生西羌,文王生北夷”的说法^[8],事实上无论夏、周还是杞,都是正宗的华夏族裔。历史上华夏与四夷的关系犬牙交错、错综复杂,或打或和、时敌时友,在历史的舞台上上演令人眼花缭乱的连续剧,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华夏与四夷相互关联、相互融合,包括血缘的互相融合。

随着历史的发展,“华夏”与“四夷”的概念不断变化,整体趋势是华夏的外延渐趋扩大。黄帝曾“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④;禹会诸侯于涂山也有“执玉帛者万国”;成汤革命后“存者三千余国”;武王克商时“有千八百国”^⑤;战国仅存“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⑥;随后便是秦扫六合一统天下。从“万国”到“一统”的过程,也是华夏与四夷融合的过程。最终消除华夷界限的因素很多,包括文化普及与武力兼并,但其中血缘融合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华夷融合奠定了汉族形成的基础,因此黄帝不

① 《左传·襄公十四年》

② 《史记·楚世家》。

③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④ 《史记·五帝本纪》。

⑤ 《历代疆域表》。

⑥ 《战国策·刘向书录》。

只是华夏族的血缘先祖,也是汉族最主要的血缘先祖。

除了汉族,历史上还有一些少数民族自称黄帝族裔。最突出的例子是北魏的建立者拓跋族。《魏书·序纪》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之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魏书》卷二十三载:“魏桓帝崩,卫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碑云:‘魏,轩辕之苗裔’。”类似说法在北魏其他墓志铭中亦很多见,如《北魏大妃李妃墓志》说大妃李氏“鸿肇其于轩辕,宝胄启于伯阳”,《魏故持节左将军唐耀使君墓志铭》也有墓主为“轩辕伊裔,陶唐厥遗”的文字。

正如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融合体,中华文化也是以华夏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体,而黄帝文化是华夏文化的基石。中国境内与黄帝时代相对应的新石器文化很多,包括仰韶文化中晚期、庙底沟类型、洛阳王湾类型、后岗类型晚期、下王岗类型中期、秦王寨类型、大河村类型、史家类型、西王村类型、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红花套一期文化、薛家岗文化、山背文化、马家浜晚期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早期文化、台湾前新石器文化、师赵村文化遗址、石岭下文化遗址、马家窑类型文化、红山晚期文化等等。其中炎黄族主要活动区域——中原地区的文化最初并未处于发达进步的前沿。考古发现证实,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大汶口文化的原始农业、家畜饲养业有了长足发展;各种手工业——包括石器、玉器与骨角器制作技术与建筑技术都超过了中原同期水平;制陶工艺达到中国制陶史上的顶峰;私有制、父权制以及阶级的出现也略早于中原地区^[7]。正是由于文化水平高于炎黄集团,东夷集团才能够在涿鹿战前与炎帝的争执中致使后者节节败退,才能在涿鹿战中令黄帝“九战九不胜”,才能在涿鹿战后的民族重组与融合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开始时未能遥遥领先,但是中原地区占有的优越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使这个核心区域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凝聚力,便于它博采和吸纳。在周围各种文化的影响和激荡下,中原地区得到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全面营养,从而“在前第三纪后半叶形成高于周邻的中心地位”^[9]。因此虽然大汶口等文化曾先走一步,以黄帝为重心的炎黄集团还是率先进入了文明社会。建立于炎黄和东夷两大集团文化联盟基础

之上的中原华夏文明随后形成。

二、当今黄帝祭祀是文化角度的人文初祖祭祀

由于具备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双重条件,中原地区成为中国文明史上最活跃的文化大熔炉。各种文化在这里辐辏、交流、融汇、贯通,最终锻造出更加优秀的文化,并向周围辐射。华夏文化就是这样不断升华、传播,成为中华文明的恒久根基。这种文化向心结构在史前已经固定,日后无论哪个文化区域占据主导地位,都会固守中原特色。因此在寻根探源时,中华文明的开端便会追溯到黄帝,黄帝也就成了中华人文始祖。

将黄帝作为人文祖先祭祀,很早就有记载。《国语·鲁语上》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颡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颡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喆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据于右任的《黄帝功德纪》一书介绍,黄帝一生的发明创造包括衣、食、住、行、农、工、矿、商、货币、文字、图画、弓箭、音乐、医药、婚姻、丧葬、历数、阴阳五行、伞、镜等,共20个方面。其中凡属可以从实物方面表现的,几乎都在龙山遗存中得到了印证。正如考古学家所说,黄帝时代“农业生产已经社会化,部分手工业已专门化,知识分子(应包括巫师集团)已经阶层化,原始宗教(包括丧俗祭祀)规范化,出现了酋邦王国,出现了政权组织的雏形,许多重大的创造发明,像雨后春笋般的都在这一时期出现”^[10]。在早期社会中,这些文明成果对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中获益的不止嫡系子孙,因而对其感恩戴德的也决不限于血缘传人。

源于黄帝文明的华夏文明,也始终因其优势吸引着少数民族。无论是通过传播(指一个社会的习俗或惯常做法流传到另一个社会)还是涵化(指两个社会之间发生密集而直接接触,人们被迫做出重大文化改变),华夏文化都对少数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时间上看,三代之中四夷对中原文明的仰慕之情屡见竹帛,如《左传·襄公四年》记载夷羿代夏后“因夏民以代夏政”;《诗经·长发》吟唱汤革夏命后“禹敷下土方”即承认夏人祖先的功德;《荀子·王制》提到周公出征时“南征而北国怨,曰:‘何

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满族把握历史机遇建立清代而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后,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稽中原之古,右汉族之文”的社会风气,很快同化于更为先进的华夏文明,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祭祀华夏始祖轩辕黄帝。从空间上看,位于中华大地这一地理单元西南部的藏族地区,其原始神话及考古发现都呈现出与中原文化的关联性,如在云南的迪庆藏族地区流传着“女娲娘娘补天”的神话^[11],西藏细石器文化源于华北地区、新石器文化也受到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12-13]。这些都表明了中华内陆古文化对西藏高原文化的深厚影响以及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深层次的历史文化联系。当然我们在强调汉族对中华文明重要性的同时,也绝不能忽略少数民族的贡献,身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一样为这一古老伟大的文明倾注了心血,奉献了精华。少数民族不仅仅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传播者,同时也是这一伟大文明的捍卫者。从西藏抗英到朝鲜族抗美,从英雄东归到抵御倭匪,各族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发展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谁也离不开谁”^[14]。正是通过吸收成果、参与创造,少数民族文化与华夏文化紧紧相连、融会贯通。

汉族通过与少数民族的不断融合,“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15],中华文明也是通过兼收并蓄,最终形成其多元特征,枝叶繁茂、芬芳四溢。雪球再大,有其内核;树木参天,有其直根。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滥觞,中原是中国文明的基地。黄帝时代就是中国文明的源头,黄帝文明就是中华文明的直根,黄帝就是中华儿女的文明始祖。每一个在中华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华儿女,血液里都流着黄帝所开创的文化基因。基于文化的角度,可以说“中华民族之全体,均皆黄帝子孙也”^[16]。

三、当今黄帝祭祀并非宗教活动

有人认为黄帝祭祀是一种宗教活动,“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违背科学精神”,甚至说公祭黄帝“违反《宪法》”^[17-18]。虽然发表这种言论的只是个别人,但黄帝祭祀是否属于宗教活动,许多人都说不清楚,值得探讨。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宗教的基础是信奉超

自然的实体。通俗地说,宗教以承认神的存在为基础,要人服从神的意志,崇拜神的力量,以神的力量为人的命运依托和归宿。在行为层面上,宗教有一定的组织和仪规,包括祭祀在内,但是并非所有的祭祀都可以归入宗教活动。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有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宗教观念,当时的祖先祭祀属于宗教活动。不过,西周的上帝祖先崇拜已经加入了重视人力作用的因素,强调人的道德水平可以影响鬼神的意志,将古代宗教伦理化。这对以后中国宗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西周以后,强调实践理性的儒家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进而发展为“神道设教”思想。儒家学派不反对祭祀,不主张废除祭祀,但也不依靠祭祀治国。在他们看来,治国要依靠人的现实努力,祭祀只能对现实政治起文饰作用。这种主张本质上已经抛弃了宗教,只是保存了传统宗教的某些形式。后来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对宗教的态度也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秦汉以后的历代帝王一方面宣称“受命于天”,以神道将王权神圣化;另一方面,将王权置于神权之上,不给任何一种宗教以“国教”的地位。这种政策就是既利用宗教,又与宗教保持一定距离。

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看待中国人的黄帝祭祀,我们不难发现,黄帝祭祀与宗教的关系有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史前的黄帝祭祀基本是祖先祭祀,不过由于原始宗教统治着当时人类的观念,在史前人类心目中氏族部落首领是有神性的。祖先——死后的氏族部落首领同样具有神性。祖先是曾经活在现实世界的人,祖先又具有神性,是祖先观念中的两种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两种因素的消长变化影响中国人祖先崇拜与宗教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始终没有成为典型意义的宗教,又长期与宗教纠缠不清。将黄帝作为天帝祭祀始于战国秦汉间,延续到中国封建社会。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先祖祭祀一直没有中断,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越来越重视作为帝王的黄帝祭祀,近代以来则特别突出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先祖的祭祀。由此可见,黄帝祭祀与宗教活动的关系如何,不能一概而论,应该根据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作历史的分析,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

应该着重说明的事实是:黄帝是史前实际存在过的真实人物。在人们头脑中充满着神灵、不借助

于神灵简直不可能进行思维的远古时期,黄帝的确被认为具备神性。人类学家发现,在现存的酋邦社会中,如太平洋诸岛屿几乎所有的地域,至今还可以遇到神化的酋长或王,他们被认为或自认为是神、天、精灵、太阳、神的直系子孙、神灵附体者。但事实上,他们却无一例外地都是现实的人。这证明黄帝在远古被赋予神性是完全可能的。进入文明社会后,接受祭祀的黄帝一度被升格为天帝或上帝,他的周身披挂上了染着神仙色彩的外衣。历史被神话化了,但它还是历史的神话。事实上在中国人心中被神话化的历史人物远不止是黄帝。思想上开创了“中国之路”的孔子^[19],提三尺剑居马上得天下的刘邦,备受下层百姓爱戴的包青天,等等,他们的身上或浓或淡都围绕些神气,而当今中国人并未因此以之为神。在当今黄帝祭祀中,无论公祭还是民祭,黄帝都是作为始祖受祭的。在祭文中,行祭者始终没有向他表达过祈福禳灾的愿望,表达的只是对祖先的怀念、颂扬以及对国情的总结和展望。这些都表明在当今行祭者的心目中,黄帝完全脱离了神性。在祖宗崇拜的层面上,黄帝与后人的关系是永恒的。并且在这永恒之中,无论祭典是否举行,行祭者都不会也不需要受到“教会”的约束和支配。

在中国语境中,祭祀的对象不仅仅是神。《礼记·祭统》载“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这是对去世的双亲而言。赡养在世的双亲是尽孝,祭祀是在双亲去世后表示继续赡养,继续尽孝。关于祭祀的作用,《国语·楚语下》说:“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去世的双亲未必是神,祭祀作用的实现不需要通过神,可见祭祀与神没有必然联系。相反,根据先秦时代已经形成的原则,可以万世享祀者往往是那些造福万民的英雄。《国语·鲁语上》中展禽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肆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从中不难看出,祭祀活动本身表达的是对那些业已远去的“有功烈于民者”的追思和歌颂。用祭祀的方式来纪念对民族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以表示崇德报功之意,使之流芳千古。

就祖先祭祀而言,祭祀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死者,毋宁说是为了生者。通过祭祀培养生者对祖先

功德怀念之情和恭敬之心的一种方式,进而影响世道人心,使社会风气醇厚。其中的人文色彩远远浓于宗教色彩,人事比重远远大于鬼神比重。

明末清初进入中国的一些天主教传教士们通过悉心观察,也看到了中国祭祖活动的非宗教性质。如利玛窦说到:“所有儒士上至皇帝下至地方最低官员,都要参加祭祖。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把祭祖看成是对死去的祖先的尊敬,尊敬祖先就象他们在世那样。他们不会相信死者真的会需要摆在冢前的食品。不过他们说,按照他们的传统说法,这是对他们亲爱的人的逝世表示悼念的一种最好形式。事实正是如此,许多人都认为举行这种特别礼仪,首先出于为活着的人的利益考虑,而不是死人。这样做可以教育他们的后代和没有教养的人懂得如何孝敬和赡养还活着的父母。因为他们亲自目睹到死去的先辈,如何受到那些有学问、有地位的人的尊敬。这种在死者冢前供摆祭品的礼仪,不应视为对基督教神灵的亵渎,也不能说它是受迷信的影响。因为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的祖先奉为神,也没有向祖先祈祷,要求得到一件东西和实现一个愿望。”^[20]利玛窦的后继者闵明我、徐日癸、安多和张诚等人也持相近看法。可见,在真正的神职人员眼中,中国人的祭祖也不是宗教,而只是一种为了表示对先辈的爱敬同时教育后代恭行孝道的特别礼仪。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表达对神的崇拜”只是“祭祀”的部分内涵;表达对祖先的种种情感包括崇敬、思念、感恩、歌颂、效法等等为祭祀,与神没有必然联系,并非宗教活动。对黄帝祭祀的真实意蕴是通过对人文始祖功德的颂诵、在虔敬缅怀的情境中达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激励后代奋发有为的积极作用。正如张岂之所说:“我们不是古代祖先神的崇拜者。我们黄帝祭祀陵,不是把黄帝当成神灵来祭祀,而是在一种肃穆的气氛中,追思中华民族先辈们如何创造文明,如何造福子孙。我们要继承和发展他们的事业,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21世纪真正实现。因此,我们的祭祀,在形式上也应当是人文的,而不是神化的”^[21]。

四、结语

被华夏儿女作为祖先祭祀的黄帝,实际上兼具着中华民族血缘先祖与人文始祖双重身份的华夏共

祖,这两种身份或两种含义的统一是华夏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当今的黄帝祭祀,其实质是中华民族对血缘先祖和人文初祖祭祀活动的有机统一,与封建迷信残余或宗教活动无关。

参考文献:

[1] 杨向奎.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论丛[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

[3] 邹衡.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4] 吴锐. 中国思想的起源:第 2 册[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

[5] 韩康信,潘其风. 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J]. 考古学报,1984(2):245-263.

[6] 韩康信,潘其风. 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墓葬人骨的研究[J]. 考古学报,1979(2):255-270.

[7] 高广仁. 海岱区先秦考古论集[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8] 桓宽. 盐铁论校注[M]. 王利器,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92.

[9] 白云翔,顾智界. 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M]. 考古,1992(6):526-549.

[10] 许顺湛. 黄河文明的曙光[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11] 林继富. 藏族天梯神话发微[J]. 西藏研究,1992(1):102-109.

[12] 侯石柱. 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为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而作[J]. 文物,1985(9):1-8.

[13] 童恩正. 西藏考古综述[J]. 文物,1985(9):9-19.

[14] 江泽民. 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 (1993-11-07) [2015-03-23]. <http://www.cppcc.gov.cn/2011/09/28/ARTI1317198033476145.shtml>.

[15] 周伟洲. 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

[16] 于右任. 黄帝功德纪·序[O]. 南京仿古印书局,1935.

[17] 葛剑雄. “国家级”公祭黄帝质疑[J]. 南风窗,2003(15):60-61.

[18] 葛剑雄. “国家级”公祭黄帝于法无据[N]. 南方周末,2004-04-08(2).

[19]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20] 林金水. 儒教不是宗教——试论利玛窦对儒教看法[J]. 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135-138.

[21] 张岂之. 心祭重于形祭[J]. 华夏文化,2005(1):4-7.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worship of HUANG Di

HE Yua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worship of HUANG Di is a glorious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has exis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s an important ceremonial activity in the Chinese history,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 is obvious. It is the worship of the consanguineous ancestor of the Chinese ethnic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lood relationship. It is the worship of humanistic ancest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Considering the nature of worship, it is a unity of consanguineous ancestor and humanistic ancestor by the Chinese people.

Key words: the worship of HUANG Di (Yellow Emperor); the worship of ancestor; the humanistic ancestor; cultural implication